

叙事中的天花：将疾病控制写入冷战历史^{*}

[美] 马雪松^{**}撰 邢承吉^{***}译

摘 要 本文聚焦于 1958—1977 年的“消灭天花项目”（SEP），从冷战视角审视这一国际公共卫生行动，揭示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罕见的合作。研究表明，消灭天花项目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项目，更是冷战历史中的重要篇章。它展示了国际组织、跨国知识共同体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国家中心视角。尽管美苏两国存在意识形态对立，但在消灭天花这一全球性议题上实现了跨越

^{*} 本文中文版的翻译工作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跨国史框架下的中基会研究”，编号：320-63243017）的资助。本文英文版参见：Erez Manela, “A Pox on Your Narrative: Writing Disease Control into Cold War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4, No. 2 (April 2010)。原文经 David Armitage、Matthew Connelly、Niall Ferguson、Julia Irwin、John R. McNeill 等人评阅。译文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赵梦佛协助校订。

^{**} 原名埃雷兹·马内拉（Erez Manela），中文名马雪松，现为哈佛大学历史学系弗朗西斯·李·希金森历史学教授（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对外关系史、“世界中的美国”。马雪松 2003 年在耶鲁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为杰出的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马雪松的代表作包括《威尔逊时刻：民族自决与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的国际起源》（*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2007），主编有《全球震荡：透视 1970 年代》（*The Shock of the Global: The 1970s in Perspective*, 2010）、《一战帝国（1911—1923）》（*Empires at War: 1911-1923*, 2014）等。他目前的研究兴趣，一是从全新的角度研究二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二是从更加宏大的历史语境探讨 20 世纪 60—70 年代人类消灭天花的历史历程（本文即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作品）。

^{***} 邢承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政治分歧的卓越合作。项目最终于 1977 年在全球成功消灭天花，不仅是医学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冷战时期国际合作的典范。作者呼吁将疾病控制写入冷战历史，拓展国际史研究的叙事边界，关注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

关键词 消灭天花项目；世界卫生组织；美苏关系；公共卫生

1958 年 5 月，苏联卫生部副部长维克多·M. 日丹诺夫（Viktor M. Zhdanov）博士抵达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年度最高决策会议——世界卫生大会。^① 此行意义非比寻常：为响应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提出的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新政策，这是自十年前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成立以来，苏联代表团首次被派往该论坛。^② 不仅如此，日丹诺夫在大会上一鸣惊人，号召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一次消灭天花的行动，以期彻底根除这种古老而致命的疾病。鉴于大会的举办地点，日丹诺夫一开始就引用了一个半世纪前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写给天花疫苗发明者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的一封信。杰斐逊于 1806 年写信给这位英国医生，声称这一发明将确保“未来各个国家唯有通过历史记

① 大会通常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日内瓦的万国宫召开。为纪念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十周年，大会应明尼苏达州参议员、长期倡导国际主义的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之邀，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汉弗莱希望借此展示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

② 1948 年，苏联及其他苏联阵营国家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抗议该组织未能为东欧提供足够的资源。然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其章程中并无退出条款，因而继续将这些国家视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参见：Javed Siddiqi, *World Health and World Politics: The World Health Origination and the UN System* (London, 1995), pp. 104–109。

载方能知晓天花这一恶疾曾存在过”。^①

如今看来，这位“蒙蒂塞洛庄园的先贤”（Sage of Monticello）还是言之过早。虽然在詹纳 1796 年发明天花疫苗后的数十年间，疫苗已被广泛使用，然而一直到 20 世纪中叶，天花仍未被根除。日丹诺夫提出倡议之时，天花在全球南方依旧肆虐。就在 1959 年，日丹诺夫此行的次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设立了“消灭天花项目”（Smallpox Eradication Program, SEP）。但是，当时世界卫生组织聚焦于一项由美国支持的备受瞩目的消灭疟疾运动，消灭天花项目则许多年来因缺乏经费与人手而停滞不前。然而，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全球消灭疟疾运动仍进展甚微。^② 随着越战升级，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持续恶化，力图促进国际合作、重振美国在第三世界形象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终于决定支持消灭天花项目。为了呼应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1962 年作出的登月承诺，约翰逊总统于 1965 年 5 月宣布，美国将在未来十年内致力于消灭天花。^③

1967 年，世界卫生组织终于配备了资金和足够的人力，开始“集中”在全球范围消灭天花。此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仍有约 200 万天花致死病

① “Future nations will know by history only that the loathsome small-pox has existed.” 源自托马斯·杰斐逊致爱德华·詹纳的信，1806 年 5 月 14 日，载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托马斯·杰斐逊文集》。世界卫生大会文件中曾引用该句，但经过“英—俄—英”二次翻译后语义略失其雅：“in the future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will learn about this disgusting smallpox disease only from ancient traditions.” 参见：“Eradication of Smallpox: Report Submit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SSR,”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缩写为 *ORWHO*），No. 87（1958）：508；亦见：F. Fenner et al., *Smallpox and Its Eradication*（Geneva, 1988，以下缩写为 *SAIE*），pp. 366–368。

②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对疟疾防治运动的兴衰进行了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叙述，参见：“The Mosquito Killer,” *The New Yorker*, July 2, 2001, pp. 42–51。兰德尔·M. 帕卡德则提出了更具批判性的见解，参见：Randall M. Packard, “‘No Other Logical Choice’: Global Malaria Erad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Parasitological* 40（June 1998），pp. 217–230；Randall M. Packard, “Malaria Dreams: Postwar Visions of Healt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Medical Anthropology*, Vol. 17（1997），pp. 279–296。

③ 1965 年 5 月 18 日白宫新闻发布会，参见：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Ex HE/MC, box 6,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以下引作 LBJL），Austin, Texas。

例。^① 此后的十年间，消灭天花项目付诸实施，在三大洲几十个国家展开行动，地区范围从巴西穿越非洲撒哈拉沙漠西部、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至印度尼西亚群岛，横跨覆盖全球南方的弧形疫区带。该计划的实施不仅需要技术、科学与组织管理，更需要应对多层面的政治文化冲突，包括：日内瓦国际论坛上的政治博弈、与成员国签订“国家协议”的外交斡旋，以及同一系列当地人——从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族埃米尔到印度北方邦的村民——协商疫苗接种的问题。在美国提供大部分经费、苏联承担疫苗供应的情况下，天花最终于 1977 年在全球范围得到彻底根除，这一成果也在 1980 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承认。这标志着人类第一次成功根除了一种重要传染病，并为后来所有根除疾病的计划（包括艾滋病、肺结核以及小儿麻痹症）提供了先例。^②

考虑到仅在 20 世纪天花就造成了约 3 亿人死亡——是 20 世纪所有战争总死亡人数的两倍多——因此消灭天花可以说是战后最重要的行动之一。^③ 鉴于天花在全球南方肆虐的情况，而两个超级大国又都参与到这一项目中来，该项目的确可被视作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介入第三世界”的行动之一。它与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近来探索的介入形式有着明显区别。^④ 它的主要介入方式并不在军事、政治或经济方面，虽然它涉及了所有这些方面。这一项目在世界各地实施的十年间，恰逢全球南方多场重大后殖民冲突，包括 1967—1970 年的尼日利亚内战、第三次印巴战争（1971 年孟加拉国独

① 这大致相当于艾滋病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以及每年因疟疾死亡的人数的两倍。数据参见网站：www.globalheathfacts.org。

② *The Global Eradication of Smallpox: Final Report of the Global Commission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Smallpox*, Geneva, December 1979 (Geneva, 1980)。

③ 3 亿人死亡这一数据引自奥德斯通等人的研究，参见：Micheal B. A. Oldstone, *Viruses, Plagues, & History* (New York, 1998), p. 27；其他人则估计死亡人数高达 5 亿。鉴于 1918—1919 年流感的大流行在不足一年内已夺走至少 2100 万条生命（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认为死亡人数“可能仍被严重低估”），故该估算并非不合情理。参见：Alfred Crosby, *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 The Influenza of 1918*, 2nd ed. (New York, 2003), p. 207。20 世纪战争的死亡人数，参见：Niall Ferguson, *The War of the World: Twentieth Century Conflict and the Descent of the West* (New York, 2006)。

④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2005)。

立)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期非洲之角(The Horn of Africa)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当时正值美苏冷战,消灭天花项目却持续依靠美苏两极之间的合作得以运行,因而它成为冷战竞合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两个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兴趣日益增长,这种兴趣源于冷战竞争,却促成了冷战历史上最成功的超级大国合作实例。

然而,消灭天花项目的故事不只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案例,将它写入冷战史,还需要我们拥有对国际社会更为开阔的观念,即在关注国家行为体的同时,不仅要承认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多国合作及跨国“知识共同体”在生产、循环、利用知识方面扮演的角色,还要把它们结合起来加以关注。^①这种整合将建立在近期一些重要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些研究探讨了国际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在阐释全球发展史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继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开创性的研究之后,阿米·L.S.史泰博(Amy L.S. Staples)的研究使我们思考20世纪的国际史中国际行为体的兴起及其影响,而马修·康奈利(Matthew Connelly)则启示我们,需要具备“超越国家”的观察视角,以期理解那些在构想与执行层面,超越甚至无视国界存在的各类运动。^②与此同时,医学史的研究者也开始在更宽阔的国际政治视野下思考战后的国际医疗行动。如果能将关注发展的国际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同关注国际事务的医学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则必将有新

① 关于国际事务中的知识共同体,参见:Peter M. Haa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No. 1 (Winter 1992), pp. 1–35, 以及同刊特辑的其他论文。

② Akira Iriye,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erkeley, CA, 2002); Amy L.S. Staples, *The Birth of Development: How the World Bank,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ve Changed the World 1945–1965* (Kent, Ohio, 2006); Matthew Connelly, “Seeing beyond the State: Population Control and the Question of Sovereignty,” *Past & Present* 193 (2006), pp. 197–233; Matthew Connelly, *Fatal Misconception: The Struggle to Control World Population* (Cambridge, MA, 2008)。“超越国家的视野”(Seeing beyond the State)一语呼应了詹姆斯·C. 斯科特的研究,参见: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eaven, CT, 1998)。

的收获。^①

近期学界突破冷战视角,在开辟战后国际史研究的新路径方面做了大量的尝试。^②然而,冷战仍旧是战后历史的叙事中心。尽管消灭天花项目的历史不必囿于冷战语境,但将它与冷战结合起来的研究路径,无疑将大大丰富我们以往的认知。本文旨在把消灭天花行动写入冷战历史,突出消灭天花项目的历史与冷战史的交汇之处,从而对以往的冷战研究有所贡献。对消灭天花项目的回顾将有助于阐明这段历史中三个重要的主题。第一,美苏关系,尤其涉及第三世界。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已非常成熟,然而主要还是从超级大国互相竞争的角度出发展开研究。依靠美国经费和苏联疫苗支持的消灭天花项目,将使我们得以追问超级大国之间的“合作”这一未被充分阐释的、悖论性的题目。第二,这一研究将使我们重新理解国际组织与国际网络扮演的角色。虽然这一直都是国际关系、国际法、社会学的热门话题,但对历史学家而言,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③第三,撰写消灭天花项目的故事,将为新近兴起的冷战发展史提供新的思路。^④将消灭天花行动写入冷战历史,并不要求找到新的视角,但要求我们拥有更为

① 参见: John Farley, *To Cast Out Disease: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Division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913-1951* (New York, 2004); Anne-Emanuelle Birn,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Rockefeller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Revolutionary Mexico* (Rochester, NY, 2006); Marcos Cueto, *Cold War, Deadly Fevers: Malaria Eradication in Mexico, 1955-1975* (Baltimore, 2007); Randall Packard, *The Making of a Tropical Disease: A Short History of Malaria* (Baltimore, 2008); Alison Bashford, "Global Biopolitics and the History of World Health,"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 No. 1 (2006), pp. 67-88.

② Matthew Connelly, "Taking Off the Cold War Lens: Visions of North-South Conflict during the Algerian War for Independ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 (2000), pp. 739-769.

③ 国际关系方面,参见: Andrew Hurrell, *On Global Order: Power, Valu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2007)。国际法方面,参见: 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2004)。社会学方面,参见: John Boli et al.,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No. 1 (1998), pp. 144-181; John Boli and George M. Thomas (eds.), *Constructing World Cultur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nce 1875* (Stanford, CA, 1999)。新近的研究回顾,参见: Jeremi Suri,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Non-State Actors," *Palgrave 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ed. Patrick Finney (London, 2005), pp. 223-246。

④ 关于“发展史”的研究概述,可参见: Nick Cullather, "Development? It's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24 (2000), pp. 641-653。然而,在这个发展迅速的领域,该文已经略有过时。

开阔的视野。我们不仅要消灭天花项目视为公共卫生的项目，而且要考虑它深刻嵌入了政治、价值观、文化背景这些同战后国际关系紧密关联的诸多方面。

天花是一种由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诱发的严重传染性疾病，通常经由呼吸道进入人体。它起初的症状表现为发烧、疼痛和萎靡不振，之后几天，周身会出现大量满是脓水的脓包，主要集中于脸、手、足这些部位。它扩散的过程是从斑点到丘疹再到脓包，最后结成痂，大约经历两周。如果病人侥幸活下来，这些痂就会脱落并留下明显的疤痕，伊丽莎白一世曾试图用浓妆遮掩这种疤痕。^①几千年来，上至国王下到庶民均难逃天花的魔爪，其致死人数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单一病原体。有时它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在哥伦布时代，它曾造成美洲人口的大量死亡。近来一位历史学家又宣称，天花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②这一疾病衍生出一系列的变异，有些相对温和，有些则几乎无一例外地致命，其最常见的类型大约在两周内就会使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死亡。幸存者可获得终身免疫力，但由于作为易感人群的新生儿的增加，该疾病在数个世纪一直在全世界许多地区流行。^③

引入疫苗的技术手段可以追溯到古代，但所有这类技术都需要先使健康的人体感染天花。因此，接种者通常要冒着生命危险。詹纳在1796年发现，将从感染牛痘病毒（cowpox virus，与天花病毒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牛身上取样的脓包汁液注射到人体，人类就可以获得对天花的免疫能力，而不必冒着感染天花的危险。^④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疫苗的使用传到了欧洲

① 关于伊丽莎白一世患天花的经历，参见：Donald R. Hopkins, *The Greatest Killer: Smallpox in History*, 2nd ed. (Chicago, 2002)。

② Alfred W.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1972), esp. pp. 2-62; Elizabeth A. Fenn, *Pox Americana: The Great Smallpox Epidemic of 1775-82* (New York, 2001)。关于疾病对历史的影响，参见：William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New York, 1976)。

③ Cyril William Dixon, *Smallpox* (London, 1962), chap. 10.

④ Cyril William Dixon, *Smallpox*, Chap. 12。“疫苗”（vaccine）这一术语源自拉丁语“牛”（vacca），为纪念詹纳而创。

和美国,也随着各殖民帝国的扩张逐渐传入了亚洲和非洲。^①但是,在20世纪初,天花仍旧是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地方性疾病。此外,在许多地方,医护人员与普通大众非常反感接种疫苗。例如,波士顿在1901年就曾遭遇一次天花的肆虐。25年以后,当欧洲报告当年天花死亡人数降至700例(不包括苏联)时,国际联盟卫生署的一位官员称这一数据“异常低”,怀疑存在漏报。^②一直到20世纪中期,疫苗的推广才在很大程度上使欧洲和北美消灭了天花。然而,即便如此,在全球南部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南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印度尼西亚以及巴西,这种疾病仍然流行。^③

日丹诺夫在1958年向世界卫生大会提交的呼吁消灭天花的报告中强调了苏联国内消灭天花的成功。沙皇时代的俄国只是零星使用疫苗,而到了苏俄时代,革命政权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首批行动就包括列宁本人1919年颁布的法令,其规定所有人口必须强制接种天花疫苗。^④列宁与斯大林对这一法令的积极推动,使苏联到1936年已经消灭了天花。苏联领导人遂将天花的消灭同控制其他疾病方面的成功一起,视作其统治合法性与自豪感的标志予以庆贺。^⑤此外,有别于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一贯姿态,疾病控制一直是苏联愿意在国际组织中积极参与的合作领域。虽然当时莫斯科和国联其他成员国之间关系紧张、彼此猜疑,一直到1934年苏联才正式加入国联,但公共卫生问题上的合作却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一直持续。不仅如此,国联

① 疫苗传入欧洲的情况,参见:Peter Baldwin,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1830-1930* (Cambridge, 1999), chap. 4.

② 未署名的备忘录,1927年12月9日,box R940, folder 39435, 国联档案馆,日内瓦,瑞士。

③ SAIE, chap. 8; *Second Report on the World Health Situation, 1957-1960* (Geneva, 1963), p. 16.

④ A. T. Kravchenko, "Lenin's Decree Concerning the Control of Natural Smallpox," *Voprosy virusologii* 15, No. 1 (1970), pp. 3-6; A. T. Kravchenko, "The History of Smallpox Eradication in the USSR," *Zhurnal mikrobiologii, epidemiologii, i immunobiologii* 47, No. 2 (February 1970), pp. 3-8。笔者感谢玛丽娜·伊万诺娃(Marina Ivanova)帮助提供了这一俄文材料。

⑤ V. M. Zhdanov, *The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 in the USSR* (Moscow, 1959)。

其他成员曾为抑制战后苏联流行的斑疹伤寒作出过重要贡献。^① 到 20 世纪 30 年代，虽然冲突仍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在疾病控制领域，强调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已成为一股思潮。^② 当代一位圈内人士兼历史学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无论其他关系变得多么敌对或竞争激烈，预防疾病传播方面的国际合作都会平静地一直持续下去。”^③

日丹诺夫 1958 年的提议，折射出十多年来苏联拒绝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之外的一段重要历史。日丹诺夫号召人们用苏联的办法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天花。他提出一个五年计划，强制让全球各地方所有人口都接种疫苗（虽然该计划也将无法推行这一措施的地区排除在外）。^④ 关于在全球范围消灭天花的必要性，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实际。日丹诺夫认为，世界正在不断一体化，而病原的传播也逐步趋于全球化。虽然苏联已经在国内消灭了天花，但它仍旧受到从狭长的边境地带——如从伊朗和阿富汗这些地方——传入天花的困扰，每年仍有数百例病例。此外，随着航空旅行不断增多，即使是不与任何感染地接壤的全球北方国家，也不得不为防止疾病入侵而维持昂贵的疫苗接种计划，以保障本国人口不受侵害。日丹诺夫推测，相较于持续的疫苗供应，统一协调的全球行动将为苏联这样的国家节省一半以上的财力。如果世界卫生组织采取这一行动，他预测不出五年，人们就有能

① 参见：Martin David Dubin, “The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sation,” esp. pp. 67–69; Marta Aleksandra Balinska, “Assistance and Not Mere Relief: The Epidemic Commission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20–1923,” esp. pp. 93–99. 两篇文章收录在 Paul Weindling (eds.), *International Health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s, 1918–1939* (Cambridge, 1995)。

② 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共卫生国际化的问题，参见：Sunil S. Amrith, *Decolonizing International Health: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1930–65* (New York, 2006), chap. I。

③ Hans Zinsser, *Rats, Lice and History* (Boston, 1935), p. 293. 这本书自出版以来就得到广泛关注，国际公共卫生工作者经常表示受其启发。更多关于这一思潮的内容，参见：James Wat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Health—A Modern Imperative,” in Records Group (RG) 90, box 42, fold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ear” [U. S. National Archives (以下缩写为 USNA), Washington, D. C.]。

④ 对这些地区，日丹诺夫建议采用所谓的“莱斯特体系”（Leicester System），即以监测、识别、隔离替代强制接种。参见：Stuart M. F. Fraser, “Leicester and Smallpox: The Leicester Method,” *Medical History* 24 (1980), pp. 315–332; Baldwin,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pp. 321–323. 结果是，相比统一强制接种疫苗而言，监测和有针对性的接种疫苗对消灭天花项目的成功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力“真正消灭”这一严重困扰公共卫生的疾病，不出十年，人类就能彻底战胜天花。^① 为了表明对这一行动的决心，苏联承诺，每年为之提供 2500 万剂耐热冻干疫苗，这种类型的疫苗在气候炎热、缺乏冷藏条件的地区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②

尽管这种实用的逻辑看似无懈可击，但苏联这一提议的政治背景却使美国的反应变得微妙起来。从 1955 年起，世界卫生组织就致力于“消灭疟疾项目”（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 MEP）这一由美国资助、与美国密切相关的项目。^③ 该项目对苏联人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他们对其持怀疑态度，并有充分理由将其视为美国在第三世界扩大影响力的一种努力。^④ 由此，消灭天花提案成为苏联在国际卫生领域把握主动权的一次行动。意料之中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最重要的“股东”——美国，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太多兴趣。世界卫生大会也只决定由总干事出面，为这一行动可能需要的技术与资金准备一份评估报告。^⑤

次年，苏联代表团继续宣传这一计划。日丹诺夫宣布，苏联每年生产 1 亿剂耐热疫苗，并可以在必要时将产量提升 3 倍。他提到苏联在 1958 年巴基斯坦天花泛滥的时候曾捐赠疫苗，并且再次承诺苏联将以同样慷慨的

① “Eradication of Smallpox,” pp. 508–512, 也见 *SAIE*, pp. 366–371。

② Resolution EB22. R12, “Gifts of Smallpox Vaccine,” Executive Board, 22nd Session, Minneapolis, Minnesota, June 16–17, 1958, *ORWHO* 88: 7.

③ 关于世卫组织启动消灭疟疾项目的缘由，参见：Jose Alvarez Amezcuita and Guillermo E. Samame, “The Philosophy Doctrine of the Concept of Eradication,” pp. 8–9, pamphlet of text presented at the Fred L. Soper Conference, Mexico City, Mexico, October 1962, RG 90, box 22, “Association-APHA-Committee on Disease Eradication,” folder, USNA。关于政治背景，参见：Packard, “No Other Logical Choice”; Randall M. Packard, “Visions of Postwar Healt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ir Impact on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s. Frederick Cooper and Randall M. Packard (Berkeley, CA, 1997), pp. 93–118; Socrates Litsios, “Malaria Control, the Cold War, and the Postwar Reorg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Medical Anthropology* 17, No. 3 (1997), pp. 255–278。

④ Siddiqi, *World Health and World Politics*, pp. 142–143.

⑤ “Smallpox Eradication: Report by the Director-General,” *ORWHO* 95 (12th WHA, 1959): 572–588.

疫苗捐赠支持在全球范围消灭天花的行动。他进一步宣称，只要付出努力，天花在两三年内就会成为历史。随后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其他几位代表发言支持这一倡议。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代表团再一次保持沉默。世界卫生大会在1959年关于这一问题的年度决议中强调了“在全球范围消灭天花的紧迫性”，敦促所有流行天花的国家立即启动天花消灭项目，并要求总干事为之提供援助和收集数据。^①然而，大会并未为此划拨任何专项资金。在华盛顿方面看来，如果苏联想要在卫生领域展示其对国际合作的热情，他们完全可以同美国一起参加消灭疟疾的项目。^②

消灭天花此时已经正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没有美国的支持，该项目在接下来几年间更多的是纸上谈兵，缺乏经费及人员支持。它的年度预算为10万到20万美元，它还雇用了一名在日内瓦管理该项目的医务官员，以及四名负责包括所有（天花）流行地区或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区工作的外勤人员。^③在每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苏联代表团都会对进展缓慢表示失望，并尖锐地将消灭天花项目缓慢的进展和世界卫生组织不冷不热的态度，与该组织在疟疾项目中巨额的投入进行对比（后者的开支在预算中占据可观的比重）。^④然而，短短几年时间内，美国政府就改变了立场，决定支持消灭天花项目。这一决策的形成体现了国际卫生专家的观念是如何与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交织在一起，从而促成政策发生转变的。

① *ORWHO* 95: 324-332, 以及世界卫生大会决议案, 12. 54, “Smallpox Eradication,” *ORWHO* 95 (12th WHA, 1959), pp. 572-588.

② “Briefing Paper—United States—Soviet Relations in Health,” September 24, 1959, 由国际健康政策各局间委员会为赫鲁晓夫1959年9月的美国之行撰写。USNA RG 59,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Subject Files 1945-1962, box 5, folder “International Health Program,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on Int’l Health Matters,” USNA. 文件建议以消灭疟疾项目展示美国对世卫组织之支持，并欢迎苏联进一步参与。

③ Donald Henderson, “Smallpox Eradication—A Cold War Victory,” *World Health Forum* 19 (1998), p. 114.

④ 可参见：*ORWHO* 103（第13届国际卫生大会，1960年），pp. 241-245；*ORWHO* 119（第15届国际卫生大会，1962年），pp. 102-105。

消灭疟疾项目 20 世纪 50 年代在国际卫生领域中可谓声势浩大，但到了 60 年代，它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且距离在全球范围消灭疟疾这一目标差得很远。^① 引发疟疾的寄生物是疟原虫（*Plasmodium*），它需要一种携带病毒的昆虫，即疟蚊（*Anopheles*），将病毒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身上，消灭疟疾项目的目标就是通过使用合成的杀虫剂（主要是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即 DDT）减少疟蚊的数量，以阻止这种传播。在世界范围内大量喷洒 DDT 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然而它却导致抗药性疟蚊的数量激增，并且 DDT 用得越多，疟蚊抗药性就越普遍。此外，DDT 还因其对环境的有害影响而备受指责，因为昆虫数量的大量减少会影响食物链，破坏生态系统。^② 天花病毒的传播则并不需要动物媒介，其通过密切接触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因而消灭它并不需要生态方面的大规模干预。（消灭）天花也有其他流行病学方面的优势。它的疫苗非常奏效，副作用少，且历史悠久。此外，天花病毒不能像黄热病毒（yellow fever virus）那样潜伏于动物体内，也不像脊髓灰质炎（polio）或者肺结核（tuberculosis）病毒那样潜伏在毫无症状的人体内。事实上，所有未注射过疫苗的人一旦感染天花病毒，就会表现出症状，而且只有患者才能将病毒传染给他人。

在消灭疟疾项目前景不佳的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流行病学家开始将消灭天花视为一个更有希望的目标。鉴于卫生领域的政府官员同政府外专业人士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求学经历、专业组织的成员身份，这一观点很快传播开来。当美国公共卫生署国际卫生局局长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写信给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成员，询问美国在消灭传染病方面应采取的安全措施时，不少人就提议应当优先考虑在全球范围消灭天花。一位协会成员写道，首先，在全球范围消灭天花几乎是“一定可行的”，相比之下，

① Staples, *Birth of Development*, pp. 161–171.

② 这是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1962 年）中的叙事重心，该书是环境改革运动中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全球范围消灭疟疾，却只是“也许可行”。^①另一位成员指出，不仅如此，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天花，对全球共同体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惨淡事实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传染病是通过人类有意识的努力而在全世界消灭的。如能通过人类自身努力，哪怕只有一次，证明我们有能力消灭一种传染病，这无疑是一件对全人类都有益的事情，我认为天花项目正符合这样的要求。”^②

不过，要将专业共识上升到国际政治层面，还需要一个能让政治领导人支持该共识的恰当时机。1965年初春，机会来了。每年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纪念日。随着消灭疟疾项目的惨淡收场，以及越战升级带来的美国在第三世界形象的持续跌落，约翰逊政府开始寻求在公共卫生领域开辟国际合作的新方式。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恰巧将年度主题定为“天花——警钟长鸣”，旨在呼吁成员国加强防控，阻止病毒从疫区向已消灭天花的国家扩散。为什么总统不借此机会从卫生、教育与社会福利署（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HEW）任命一名官员发表声明，强调天花防控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即全球北方）取得的成功，并表达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消灭天花的行動的支持呢？白宫同意了这一建议。一份由卫生、教育与社会福利署起草的声明在经过简单修订后被发布。^③

这份4月发布的声明，是美国首次在实际意义上支持日丹诺夫几年前的提议。虽然它仍旧语焉不详，但已为一个月后的具体承诺打下了基础。1965年，联合国庆祝其成立20周年，并为此决定将该年定为“国际合作年”（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ear, ICY）。为制定美国针对“国际合作年”的

① 美国国家肺结核病协会主任詹姆斯·E. 珀金斯（James E. Perkins）致欧内斯特·S. 蒂尔克（Ernest S. Tierkel）的信，1962年9月26日。1962年9月12日的一份T. 艾丹·科伯恩（T. Aidan Cockburn）的备忘录也将天花列为首先要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的传染病。RG 90, box 22, folder “Association-APHA-Committee on Disease Eradication,” USNA.

② 珀金斯致瓦特（Watt）的信，1962年8月28日，原文加下划线，RG 60, box 22, folder “Association-APHA-Committee on Disease Eradication,” USNA.

③ 列维（Levy）致霍博恩（Holborn）的信，未注明日期，以及霍博恩致霍洛维茨（Horowitz）的信，1965年3月12日，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Ex HE/MC, box 6, LBJL。

政策，约翰逊总统任命国际组织事务助理国务卿哈伦·克利夫兰（Harlan Cleveland）——一位老资格的国际主义者领导一个内阁级别的特别委员会，即国际合作国家委员会，其成员由政府官员和私人组织的代表共同组成。^①该委员会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协调内阁各部门，筹备当年深秋举行的备受瞩目的白宫国际合作会议（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约翰逊总统在前一年夏天的演说中就曾提到，这一会议的目标在于“寻找利用知识为人类谋福祉的新技术”，特别是在与贫困、疾病和资源匮乏作斗争的过程中。人类不能再错误地拉大东西方、南北方之间的界限。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因此解决方案也必须是全球性的。美国应在这些方面起到带头作用。^②

对约翰逊和他的幕僚而言，消灭天花恰如专家建议的那样，是一项花费和争议都相对较小，又能显示美国致力于全球合作的计划。世界卫生大会5月在日内瓦召开例会时，白宫就同克利夫兰及美国代表团一起起草了一份措辞恰当的总统宣言。^③宣言于5月18日发布，与世界卫生大会例会安排在同一天。宣言指出，虽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已经消灭了天花，然而这种疾病却仍旧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流行。“只要它还存在于世界的某个角落，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真正置身事外。”在总结了最近的专家共识之后，约翰逊宣称，全球消灭天花的“技术问题”是“微乎其微的”，而“管理问题”，包括疫苗供应、人员和协调工作的保障问题，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得到解决。约翰逊总统已赋予“国际合作年”以“寻找为人类谋福祉的新技术”之使命，如今“对提高世界健康水平的新方法的探索，又进一步启示人们，要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拯救濒临死亡的人们”。宣言总结道：

① 白宫新闻发布会，1964年11月24日，RG 90（Records of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box 24，fold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ear（Committee）”，USNA。

② “President Johnson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ear,”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Affairs Outline, 196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ear*, RG 90, box 2, fold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ear,” USNA.

③ 克利夫兰致凯特（Cater）的信，1965年5月14日、15日，以及凯特致约翰逊的信，1965年5月17日。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Ex HE/MC, box 6, LBJL。

美国将“时刻准备与其他有关国家合作，在1975年之前彻底将天花扫入历史的垃圾堆”。^①

虽然约翰逊的宣言没有详细说明美国将采取的行动，也没有承诺提供任何资源，但总统本人这一戏剧性的公开承诺还是引发了广泛反响，并为全球消灭天花项目的支持者提供了帮助。在日内瓦，美国代表团高调宣布了对世界卫生大会的这一承诺，并满意地报告说，大会“对这一宣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大会主席对总统的宣言深表赞赏”，并且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随后向美国代表团表示祝贺，称该宣言“内容严谨且时机恰当”。^②几天之内，疫情国家的美国代表在当地美国流行病学家的推动下，开始制订兑现承诺的具体方案。一位代表写道，将天花疫苗接种纳入美国正在支持的卫生项目是彰显总统支持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天花的承诺的“绝佳机会”。^③

新近独立的一些国家也试图抓住这个机会。上沃尔塔（Upper Volta）卫生部部长保罗·朗班（Paul Lambin）等官员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听闻了美国的承诺，随后访问华盛顿时与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的官员又提及此事，这有助于在美国援助机构内部营造出一种发展中国家对消灭天花有需求的氛围。^④5月18日的宣言，使消灭天花得以走出专家们的话语圈，并初步深入到国际政治讨论与高层外交商议的领域。这一年晚些时候，在约翰逊的助手们整理的新一批拿给总统审批的国际卫生项目中，消灭天花项目的进展已非常引人注目。^⑤到那时为止，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天花的承诺已经有了眉目。

① 白宫新闻发布会，1965年5月18日，参见：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Ex HE/MC, box 6, LBJL。

② 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致国务卿电，1965年5月19日，RG 59, box 3159, folder “HLTH 3, Organizations and Conferences, WHO, 6/1/65,” USNA。

③ 美国驻洛美使馆致国务院电，1965年5月22日，RG 59, box 3172, folder “HLTH—Health and Medical Care—T,” USNA。

④ 朗班与沃尔特·谢尔温（Walter Sherwin）会议的备忘录，1965年7月22日，RG 286, box 27, folder “HLS, Health,” USNA。上沃尔塔1960年脱离法国而独立，1984年更名为布基纳法索。

⑤ Joseph A. Califano, *The Triumph & Tragedy of Lyndon Johnson: The White House Years* (New York, 1991), p. 114.

然而,从政治工具的意义讲,关于国际合作的豪言壮语在美国国内的影响是有限的。当约翰逊将美国支持消灭天花项目和其他国际卫生倡议的决定描述为超越冷战冲突的举措时,美国官员在国内为这些项目辩护时,往往又回到冷战竞争的传统论调,将其诠释为“对抗共产主义在世界上贫苦和被压迫人群中传播的良方”。一位行政官员在阐释美国“在全球抗击疾病的攻势”的演讲中曾提到,“三分之二的人每年收入不到100美元,寿命不到35岁,并被传染性疾病困扰”。他问道:“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我且不谈所有关于人性和兄弟情谊的务虚问题。我只谈关于自身利益的务实问题……如果我们要打击共产主义,创造一个自由的世界,就必须为这些穷苦人的健康做些实事。”类似的援助将会成为一件“穿透铜墙铁壁,抵达人心深处”的“工具”。它将促进世界和平,彰显美国是“医学之源”,帮助美国的盟友“抵制共产主义的诱惑”。“如果一个人因疾病而虚弱,无法挺直身躯并参与对抗共产主义的斗争,那么他作为盟友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①因此,美国对消灭天花项目的支持对不同人群也有了不同的意义。对国际团体以及美国国内的国际主义者而言,它意味着超越冷战。对强硬的反共人士而言,它意味着赢得冷战的胜利。从后者的角度看,在同苏联合作消灭天花的过程中,美国将促使苏联自取灭亡。

但是,现实之中还有更实际的事情必须首先处理。例如,消灭天花项目需要大量的疫苗——事实证明,总共需要超过20亿剂疫苗——而只有苏联具备生产如此大量的疫苗所需的基础设施条件。^②因此,当美国公共卫生局传染病中心(Communicable Disease Center, CDC)流行病监测科科长唐纳德·A. 亨德森(Donald A. Henderson)前往日内瓦领导这一项目之时,他

① 日期不明的档案, Office Files of Joseph A. Califano, box 29 (1737), folder “Health”, 原文加下划线, LBJL。

② SAIE, pp. 469, 564.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保苏联能够继续维持对疫苗的捐赠。^①然而，他的位子坐得并不舒服。苏联人从一开始就对他的任命很不满意，并抗议说，消灭天花项目是由苏联提出的倡议，理应由苏联人领导这一项目。因此，次年5月，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当亨德森找到苏联代表团主席德米特里·韦涅季克托夫（Dmitry Venediktov），要求后者继续捐赠疫苗之时，他的心中是有些担忧的。据他回忆，苏联人的回答使他吃了一惊。那位苏联官员告诉他：“我想让你知道，我们已经对你做过审查，现在我们相信你是一位诚实的、优秀的科学家，你唯一的目标是消灭天花。我们将全力支持你。”韦涅季克托夫解释道，他也不能向美国正式保证一年有多少疫苗捐赠，但补充说，苏联计划经济的特点是，一旦确定了年生产指标，这些指标很可能每年都能顺利完成。^②

亨德森很可能因受到苏联机构“审查”而感到有些尴尬，但他仍然非常重视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并积极努力地促进双方的合作关系。在担任项目主任的这段时间里，他总是谨慎地将倡议发起者的荣耀归于苏联名下。他还与苏联官员密切合作，解决各种问题，比如苏联疫苗出现质量问题时，以保全苏联人面子的方式解决问题。他向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们表示，同苏联的关系“非常完美”。为防止双方关系紧张化，任何只要能通过“时间和毅力”来“低调、有效地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进行“公开讨论”。^③每一年世界卫生大会之前，亨德森都要同美苏双方的代表团会面，报告项目进展情况，并依靠他们之间的合作使事务提上日程。亨德森也依靠美苏两国派驻疫区的外交人员的帮助，对缺乏有效合作的世界卫生组织地方官员以及各国卫生官员施加压力，并当面批评那些不汇报进展的疫区代表。亨

① 消灭天花项目主任致美国传染病中心主任的机密备忘录，1968年10月28日，Smallpox Eradication Program papers, box 303, folder 30, 世界卫生组织档案，日内瓦，瑞士（以下缩写为WHO-SEP）。传染病中心（CDC）后来改名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但缩写仍为CDC。

② Henderson, “Cold War Victory,” pp. 115–116.

③ 消灭天花项目主任致美国传染病中心主任的机密备忘录，1968年10月28日，WHO-SEP, box 303, folder 3.

德森与韦涅季克托夫和其他苏联同行合作，建立和维护苏联疫苗生产的质量管理，并对担任项目职位的苏联候选人进行审查。最后，莫斯科研究所病毒中心同美国亚特兰大的传染病中心实验室一起，共同负责对现场采集的样本作进一步分析。^①

据亨德森回忆，只有一次，冷战的紧张气氛影响了消灭天花项目完美的合作氛围。在该项目的最后几年，在距离彻底消灭天花的目标越来越近却又尚未完全实现时，一位瑞士的医生兼项目顾问为了鼓励大家为“零天花”（smallpox zero）的目标继续奋斗，引用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68年创作的小说《第一圈》（*In the First Circle*）中语句，强调任何科学探索在完成之前的“最后一英尺”（the final inch）之重要性。这一引述在项目参与者中间广泛传播，“最后一英尺”也成为鼓励大家在寻找非洲之角最后的病例时常会提到的语句。当“零天花”的时刻终于到来，需要撰写最终报告汇报项目情况的时候，苏联方面的撰写人伊万·拉德尼（Ivan Ladnyi）却坚持要求文中绝不能提到索尔仁尼琴这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以及他曾写过的句子。亨德森写道，在整个全球消灭天花的行动中，“这是两个超级大国完美合作中的唯一败笔”。^②

由于亨德森迫切地想将消灭天花项目塑造成“冷战胜利”的一个典范，他很可能夸大了美苏合作的顺利程度。相比之下，档案的记录反映出美苏关系比他所描述的更加紧张和脆弱。尽管如此，在美苏关系这一点上，档案的记录似乎还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美国的资金与苏联的疫苗，或两个超级大国的制度保障与政治支持，消灭天花项目可能根本无法推行，遑论成功。项目总共9800万美元的开支，大约有三分之一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预算，而美国又是这些组织主要的资金捐赠者；此外，华

① 亨德森致助手D. G. 佩恩（D. G. Payne）的信，“简要汇报——赴莫斯科讨论与消灭天花项目相关事宜”，1967年7月27日，WHO-SEP, box 303, folder 30; Henderson, “Cold War Victory,” pp. 116–117。

② Henderson, “Cold War Victory,” p. 119.

盛顿还直接向项目拨款 2500 万美元。^① 当然，这笔钱相对于同期美国的军事支出来说微不足道，花在疟疾项目上的资金甚至都要超过这笔钱。但是，无论如何，这笔资金对消灭天花项目的成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苏联为消灭天花项目提供了大批量的疫苗供应，在全球消灭天花的行动中使用的 20 亿剂疫苗里，将近 17 亿剂疫苗是苏联生产的。^②

我们如何解释冷战时期两大对手之间的这一合作？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消灭天花项目的运作未受到双方最高政治领导层的关注。一旦政治当局给予该项目初步的批准——克里姆林宫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语境下推动“和平共处”政策，白宫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强调国际合作——他们便对该项目几乎没有持续的兴趣了。毕竟，消灭天花项目并不能对第三世界的政府产生如约翰逊政府救援印度饥民那样立竿见影的效果。^③ 有了最初的政治认同以后，项目的进展就要依靠像韦涅季克托夫和亨德森这样的中层技术专家之间的相互合作。这些人更看重关于科学知识、技术能力和组织所需资金的共同概念，而不是意识形态分歧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由于缺乏持续的政治监督，卫生官员得以拥有比原本更自由的行动空间。因此，当长期担任美国传染病中心主任的大卫·森瑟（David Sencer）得出结论，称他保护美国人的健康的职责允许（甚至要求）他向孟加拉国拨出人员和经费以助其消灭天花之时，他便可以在没有多少异议的情况下进行此事。^④ 所有这些都表明，要理解全球消灭天花行动，我们不应仅仅着眼于超

① SAIE, p. 464. 其他捐赠额超过 100 万美元的捐赠者有瑞典、荷兰、加拿大、丹麦以及日本造船工业基金会。

② 1958—1979 年，苏联向疫情国家双边捐赠疫苗总计 14 亿剂；美国双边捐赠疫苗 1.9 亿剂，主要流向西中非。此外，1967—1984 年，苏联向世卫组织“促进健康志愿基金·消灭天花特别账户”捐赠 2.98 亿剂疫苗，占 4.65 亿剂捐赠总额的 64%；美国仅捐赠 240 万剂。数据见：SAIE, 469, 564。

③ Kristin L. Ahlberg, “‘Machiavelli with a Heart’: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s Food for Peace Program in India, 1965–1966,” *Diplomatic History* 31, No. 4 (2007), pp. 665–701.

④ 森瑟在 1966—1977 年担任美国传染病中心主任。关于他和美国传染病中心在消灭天花项目中扮演的角色，见 Elizabeth W. Etheridge, *Sentinel for Health: A History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Berkeley, CA, 1992), chap. 14；也见劳伦斯·布里利恩特（Lawrence Brilliant）致卡利法诺（Califano）的信，1977 年 2 月 26 日，笔者持有副本。

越国家层面，而应深入探究国家内部的情况，破除国家框架的束缚，以便了解那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决策是如何在这些政府机构——如白宫、国会、国务院，外交史学家通常将这些机构与国际事务的管理联系在一起——之外形成的。

消灭天花项目上的合作也揭示了两个超级大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如何共同秉持文安立继社会理论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之后所说的“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t）的观点，即对进步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看法，尤其是当它们被应用于第三世界时。^①在上述语境中，除去社会结构方面的安排，苏联人和美国人在医疗和科技方面就什么是“高度发达的”社会达成了意见上的统一，并能够携手运用双方共同拥有的“现代”知识和专业技能，推动全球南方地区的此类发展。这就是约翰逊在宣布支持“国际合作年”之时所秉持的普遍理念，当时他呼吁开展“科学年”活动，将其作为“斗争的转折点——使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转为人与自然的斗争”，以便使处于“紧张局势中”的冷战对手“开始规划一条绕过冷战政治、直通胜利的可能性的路线”。这种对通过现代科学的力量战胜自然的呼吁，与苏联的国家核心精神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且苏联的领导人和技术官僚对这种呼吁非常熟悉。^②

当然，在第三世界发展问题上，美苏意识形态上的共通之处很难保证它们的合作，许多学者已证明，这种共通之处往往是冷战在全球南方呈现“竞争共存”局面的基础。^③这也不意味着消灭天花项目或其他项目背后的知识体系不存在竞争。研究发展体制的学者一直关注这些科学知识的代表

① Westad, *Global Cold War*, p. 397.

② “President Johnson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ear,” RG 90, box 42, fold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ear,” USNA. 关于那些年间“高度现代主义”的特征和意义，参见：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关于美苏在经济领域的共识与分歧，参见：David C. Engerman, “The Rom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w Historie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28, No. 1 (2004), pp. 23–54。

③ Nick Cullather, “Damming Afghanistan: Modernization in a Buffer Stat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9, No. 2 (September 2002), pp. 512–537; David Ekbladh, “‘Mr. TVA’: Grass-Roots Development, David Lilienth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as a Symbol for U.S. Overseas Development, 1933–1973,” *Diplomatic History* 6, No. 3 (2002), pp. 335–374.

们在争取权力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国际发展史方面的许多研究，专注于将“发展”和“现代性”作为知识话语和权力工具进行解构，认为这种发展史揭示了西方或全球北方同第三世界关系的新殖民主义性质。^① 那些关注发展项目在美国外交关系中的作用的研究，也呈现类似的模式，它们常将美国在20世纪初“改善”殖民地的作为，同战后的发展援助画上等号。^② 那些被宣传为大公无私的项目，实际上反映的是美国自身的利益；即使出发点是好的，在道德上也存在缺陷，实际上被误导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冷战中知识分子所青睐的普遍主义理论被证明不适合当地条件；最终，发展项目的结果顶多是喜忧参半，而大部分往往是灾难性的。^③ 在某种程度上，消灭天花的过程十分符合上述叙事。但在另一些方面，它又呈现出与上述叙事截然不同的面貌。

消灭天花项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同质化的现代科技知识运用到全球南方复杂的地缘环境之中，而全球南方的很多社区已经有了应对天花的传统方法，旨在改善和解释人类遭遇天花的情况。事实上，疫苗生产和质量、疫苗接种技术以及流行病监测和控制方法等方面的标准化，乃是这一项目存在的核心基础，对项目领导者来说，它们也是在全球消灭天花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许多地方，消灭天花项目的成员不得不与当地的卫生官员一道应对已经融入民间信仰体系的天花治疗模式。比如，在西非的一些地区，这意味着要与信仰天花女神“索波娜”（Sopona）的巫师们协商合作事宜或获得他们的默许；在印度，该项目则不得不应付对天花女神“希塔拉·马

① 关于将发展作为一种知识/权力体系的研究数不胜数。可参见：Cooper and Packar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尤其是导语和第2、3章；以及 Frederique Apffel Marglin and Stephen A. Marglin (eds.), *Dominating Knowledge: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Resistance* (Oxford, 1990), 尤其是第4、5章。

② 可参见：Michael E.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NC, 2000), 尤其是第2章。

③ 例如：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2003)；Cullather, “Damming Afghanistan”；David C. Engerman et al. (eds.), *Staging Growth: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Amherst, MA, 2003)。

塔”(Sitalā Mata)的崇拜及与之相关的做法。^①与此同时,在阿富汗乡间,消灭天花项目的疫苗工作者不得不设法克服女子与孩童的面纱给接种带来的困难。^②他们还要让长期采用人痘接种方法的接种员停止采用这种方法,或者用消灭天花项目提供的疫苗替换其粉状结痂物质(人痘)。这些努力包括推动立法和执法,以及社区推广,甚至要宣讲合适的道德故事,比如题为“父亲放弃了人痘接种员的工作,鼓励他的儿子成为疫苗接种员”的故事。^③

项目目标的本质不是基本控制天花疫情,而是在全球范围消灭天花。这意味着要克服对其统一要求的所有阻力,无论是通过协商解决,还是采取强制手段。对那些抵制疫苗的个人,将采取多种形式对其施加压力:持续进行口头劝说;对其施加舆论或者法律方面的压力;给予报酬;在极端的情况下,采用军事化行动,强制为其注射疫苗。^④虽然使用武力进行疫苗接种的情况并不常见,但在许多地区,不同程度的抵制都给该项目蒙上了阴影。人们早先将这种抵制视为“传统”信仰对现代科学的抗拒,但这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研究表明,这种传统信仰并不直接与抵制疫苗相

① SAIE, pp. 716, 887-888. 关于印度疫苗接种与人痘接种相互影响的批判性研究,参见:Frédérique Apffel Marglin, “Smallpox in Two Systems of Knowledge,” in *Dominating Knowledge*, eds. Apffel Marglin and Marglin, pp. 102-144.

② 亨德森致米勒(Millar)的信,1967年5月29日,WHOA-SEP, box 159, folder 378。

③ 消灭天花项目阿富汗方面主任A. G. 兰加拉杰(A. G. Rangaraj)的记述(未署日期)。关于该项目与人痘接种习俗的竞争,也参见:消灭天花项目(总部)主任亨德森致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SEARO)主任的信,1967年10月30日;在信中,亨德森抱怨道,阿富汗政府并没有宣布人痘接种是不合法的方式。另参见:亨德森1969年1月17日致赫瓦贾-怀苏丁(Khwaja-Waisuddin)的信;亨德森1969年11月17日致兰加拉杰的信;以及一份由Vladimir Sery、Svend Brøgger、Amin Fakir、Aminullah Saboor共同协作的日期不明的报告。以上参见:WHOA-SEP, box 159, folder 378。

④ Paul Greenough, “Intimidation, Coerc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Final Stages of the South Asian Smallpox Campaign, 1973-1975,”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41 (1995), pp. 633-645; Lawrence Brilliant and Girija Brilliant, “Death for a Killer Disease,” *Quest* (May/June 1978), pp. 3-10. 布里利恩特回忆了他是如何带领一群疫苗接种员在深夜闯入印度南部比哈尔(Bihar)的一个部落首领家中的。这位首领相信,抵制疫苗是他的宗教使命,他奋力抗争了一阵后,终于屈从地接受了疫苗注射。

关联。实际上，由于疫苗接种活动往往与政府或外部势力行使权力相关联，所以人们才对该项目产生怀疑，尤其是在相对偏远的地区，当地居民一看到政府官员，便联想到征税、征兵或其他剥削行为，并普遍对外部势力的意图和动机持怀疑态度。^① 亨德森声称，自己对抵制问题不屑一顾。他曾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一位印度同事，称“大多数关于抵制的故事”都源自“那些懒惰的卫生官员的臆想（或许只是他们怠工的借口）……他们宁可坐着，也不愿到处走走，并需要一个合适的借口来解释为何人们没有接种疫苗”。^② 然而，这一方面的报告就不太乐观了。一本印度的消灭天花项目培训手册是这样解释抵制现象的：抵制行为“通常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因此劝说团队必须培养一种坚持不懈的态度”。此外，手册还意味深长地提到，医护人员应当将拒绝接种疫苗者的名单汇报给上级机构。^③

不过，总体而言，对消灭天花项目的抵制多以个人方式出现，没有形成组织和一定气候。在项目涉及的广阔、多样的地域范围内，它并没有遇到从前在欧洲及北美常见的那种抵制运动，也没有遇到像肺结核疫苗 20 世纪 50 年代在印度推广时曾遇到的大规模群众抵制。^④ 因此，消灭天花项目的故事，不仅仅是当地抵制外部权威（无论是国家还是国际权威）的故事，它也是一个关于南北、东西半球互相和解、互相认识、互相合作的故事。

① 这是消灭天花项目早期，在达荷美（Dahomey）与多哥（Togo）两个非洲国家共同的研究结论。G. E. Robbins, “The Role of Fetish Practices in Vaccination Campaigns,” in *The SEP Report: Seminar on Smallpox Eradication and Measles Control in We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Proceedings of a Meeting Held in Lagos, Nigeria, May 13–20, 1969, Part I*. 未出版的美国传染病中心报告，WHOA-SEP, box 52, folder 208。

② 亨德森致德（De）的信，1972 年 7 月 7 日，WHOA-SEP, box 193, folder 436。

③ Smallpox Training Seminar, Bhopal, April 29–May 3, 1974. 也见伊恩·D·卡特（Ian D. Carter）致 R. N. 米特拉（R. N. Mitra）的秘密报告，1974 年 2 月 10 日。都引自 WHOA-SEP, box 194, folder 388。

④ Michael R. Albert, Kristen G. Ostheimer and Joel G. Breman, “The Last Smallpox Epidemic in Boston and the Vaccination Controversy, 1901–1903,”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4, No. 5 (February 2001), pp. 375–379; Niels Brimnes and Christian W. McMillen, “Medical Modernization and Medical Nationalism: Resistance to Mass Tuberculosis Vaccination in Post-colonial India, 1948–195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 History* 52, No. 1 (2010), pp. 1–30, 感谢这些作者提前发给我样稿。

毕竟，如果没有疫情国家社会各个层面的无数个人的合作，负责这一项目的国际官员和专家是无法开展行动的。此外，消灭天花项目绝大部分的现场工作人员，即超过 15 万名的卫生工作者也都来自当地社会。^①

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种与当地力量的联合，该项目在方法上展示出它非凡的灵活性，从而适应了当地的条件，无论是在政治、行政、流行病学还是在文化方面。项目启动之后不久，人们便发现，百分之百的疫苗接种率很难实现。项目组很快就把重点放在“监测与遏制”上，这种方法旨在及早发现疫情，并致力于为疫区周边一定半径内的居民接种疫苗，以阻止疫情蔓延到区域以外。^② 事实证明，消灭天花项目具有足够的弹性，可以在其一些主要运行地区（包括尼日利亚、孟加拉国、非洲之角）爆发的血腥内战中留存下来，并且经常与相关国家和非国家势力进行谈判，以便进入冲突地带执行任务。最后，消灭天花项目与冷战时期国际发展史上的许多项目不同，它成功地于 1977 年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零天花”，只比约翰逊总统在 1965 年设定的时间表晚了两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致力于消灭天花的过程中，世界卫生组织选择了最容易实现的目标，通过向最有可能被消灭的疾病而非那些最紧迫的卫生问题发起进攻，从而选择了阻力最小的道路来彰显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威和不可或缺性。正如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说：“有了疫苗，我们认识了天花。”^③ 但这还不是消灭天花故事的全部。毕竟，疫苗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具备，它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全球消灭天花这一胜利性的结局。它还需要有能力和意愿将卫生问题看作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以及更进一步，将它视作一个可以通过全球性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前提条件和组织本身，对消灭天花项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通过自身的国际权威性，折射出并形成了将疾病视为全

① Jonathan Tucker, *Scourge: The Once and Future Threat of Smallpox* (New York, 2001), p. 3.

② D. A. Henderson, “Surveillance—The Key to Smallpox Eradication,” WHO document No. WHO/SE/68.2, 世卫组织图书馆，日内瓦。

③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Nature of Mass Poverty* (Cambridge, 1979), p. vi, cited in Cullather, “Development? It’s History,” p. 651.

球性问题并在全球范围加以解决这一理念，并为对全球卫生问题进行构思、辩论和采取行动提供了框架。^① 它还为超越冷战分歧的合作提供了一个中立的空间，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为冷战中两个难以互相信任的超级大国提供了一个中立和可以信赖的平台。

然而，世卫组织与消灭天花项目的关系非常复杂。虽然该项目后来被经常视为世卫组织最伟大的成就，但在其整个实施过程中，它因为诸多原因而遭到来自世卫组织内部各方的反对。世卫组织的最高层官员，包括长期担任总干事的巴西流行病学家马戈林诺·坎道（Marcolino Candau），起初就明显对该项目缺乏热情。坎道于1953—1973年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曾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公共卫生专业，一直是疟疾问题方面的专家。在南美抵抗疟疾的行动中，他曾拔掉自己感染了病毒的牙齿。^② 在他看来，消灭疟疾项目未获得成功，乃是对世卫组织信誉的巨大打击。如果消灭天花的行动步其后尘，可能对世卫组织的声誉造成进一步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毕竟，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消灭天花意味着要给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注射疫苗，这一目标完全不切实际。此外，一些科学界的知名人物普遍认为，由于许多生物、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原因，旨在彻底消灭任何传染病的项目都是不切实际的。在当时的一本畅销书中，一位知名专家宣称，这类项目反映了现代人的傲慢。它们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乌托邦，注定会面临一个比被历史遗忘更耻辱的结局，那就是“成为图书馆书架上的一件奇珍异宝”。^③

因此，在1965年5月，当世界卫生大会的成员国一致决定把在全球范围消灭天花视作组织的“主要目标”时，世卫组织的高层官员们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某种困境。^④ 一方面，他们无法置大会的决议于不顾。另一方面，他们想要把该项目置于掌握之中，确保它既不使组织尴尬，也不偏离组织

① 关于建立卫生领域的国际权威，参见：Staples, *Birth of Development*, chap. 9。

② Ibid., pp. 143–144.

③ René Dubos, *Man Adapting* (New Haven, CT, 1965), p. 379. 也见 SAIE, p. 388。

④ 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致国务卿电，1965年5月18日，RG 59, box 3159, folder “HLTH 3, Organizations and Conferences, WHO, 6/1/65,” USNA。

的优先事项。在他们看来,倘若美国真的像约翰逊总统承诺的那样,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消灭天花,那么它最好领导这一行动并为之提供经费。因此,那年秋天,世界卫生组织的高级官员开始要求美国政府派遣曾在日内瓦担任消灭天花咨询委员会委员的亨德森领导该项目。^①次年春,当坎道提交1967年预算的时候,他提出为消灭天花项目拨款240万美元。这使世卫组织的总预算较上一年增长了16%,这一增幅远超往年。当一些发达国家的代表抱怨这一增幅太大时,对这些抗议早有预料的坎道大胆提出削减拟议的消灭天花项目的预算。他传递的信号非常清楚:消灭天花项目绝非世界卫生组织的首要任务。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此有所坚持,它们就需要自己掏钱。^②但是,倘若总干事将预算要求视为一种商议性的策略,那么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就会赞同这项表面上对他们有利的提议,并且他们对所看到的情况感到满意。因此,随后在世界卫生大会上的讨论引起了争议。法国和美国关于将预算控制在较低水平的提案被投票否决,而总干事的提案(包括为消灭天花项目提供240万美元全额资金)最终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获得通过,尽管它仅是以几票优势获得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历史上预算投票中差距最小的一次。^③

坎道很可能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惊讶,而美国的外交官则明显对第三世界表现出的这种自决主张感到不安。^④然而,美国政府内部的想法并不一致:努力争取美国对消灭天花项目支持的亨德森及其支持者对此感到非常

① 亨德森表示他只是被迫接受任命,但其他证据显示,他渴望这个职位并巧妙地得到了它。相关对比参见: Henderson, "Cold War Victory," pp. 114-115; the account in the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David J. Sencer, CDC director 1966-1977, conducted by Victoria Harden, July 7, 2006, 16 (笔者持有副本)。另参见: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致国务院电,1965年11月18日, RG 59, box 3159, folder "HLTH 8-2, Prevention, Control, Eradication, 1/1/64," USNA; 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致国务卿电, 1965年12月4日, RG 59, box 3159, folder "HLTH 3, WHO, 10/1/65," USNA。

② 详见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致国务院电, 1966年3月30日; 以及1966年春天致国务院的许多其他急件, RG 59, box 3160, folder "HLTH 3, WHO, 1/1/66," USNA。

③ *ORWHO* 152 (19th WHA, 1966): 258-264, 288-296; 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致国务卿电, 1966年5月12日, RG 59, box 3160, folder "HLTH 3, WHO, 5/1/66," USNA; *SAIE*, pp. 414-416。

④ 西斯科(Sisco)致塔比(Tubby)的信, 1966年5月19日, RG 59, box 3160, folder "HLTH 3, WHO, 5/1/66," USNA。

愉快。那年秋天，亨德森作为项目主任抵达日内瓦，从1966年项目集中启动到1977年成功消灭天花，他在日内瓦待了11年。在此期间，他仍以从美国传染病中心借调的形式工作，其工资由美国政府支付，而非由世界卫生组织支付。在地方上，消灭天花项目的绝大多数医疗与行政官员以及咨询顾问——苏联人、瑞士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埃及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同样是从各国政府借调而来，或者直接受雇于消灭天花项目的行动，而不是从世卫组织现有的工作人员中抽调的。^①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尤其是那些负责大部分实际工作的重要地区办事处的官员，常常对项目抱着怀疑态度。^②许多人希望世卫组织专注于基本的卫生保健工作，因此对消灭天花项目单一的目标存有疑虑；他们往往认为该项目的优先级较低，甚至偏离了加强提供基本卫生服务的能力的核心目标。在世界卫生大会投票表决几个月后，随着消灭天花项目集中启动，坎道的两名高级副手就起草了一份致各地区的备忘录，指出“建立永久性的基本卫生服务应当放在第一位，因为它是任何地方实现消灭天花目标的基础条件”，并指示世卫组织工作人员“准备考虑从消灭天花项目的资源中进行调配，为发展和加强项目实施地区的基础卫生服务提供必要的援助”。^③

从这个角度看，消灭天花项目的成功只是把问题复杂化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在世卫组织致力于确认“零天花”这一目标达成之时，该组织开始强调“横向”卫生干预措施而不是消灭天花项目等“纵向”项目的重要性。“纵向”项目指的是旨在解决一个特定卫生问题的项目，而“横向”干预旨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保健服务进行全面改革，强调在考虑到

^① SAIE, pp. 437–444.

^② 这类组织内部的反对意见，见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主任致世卫组织总部的“高度保密”备忘录，1967年5月1日，WHO-SEP, box 159, folder 378；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主任致世卫组织总干事的信，1967年3月16日，WHO-SEP, box 193, folder 416。也见SAIE, pp. 417–418；Henderson, “Cold War Victory,” pp. 114–115。

^③ SAIE, p. 417.

潜在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背景下提供预防性和初级卫生保健服务。^①对于以冷静务实为荣的亨德森来说,“纵向”项目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曾说,“纵向项目是一种有组织、可监督,且有质量保障的项目”,而“横向项目”一词在他看来只不过是“正在工作的人员的姿态”。^②但是,国际卫生组织的其他人员批评纵向项目以放弃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广泛的系统性(医疗)改革为代价,强调狭隘的卫生措施的可量化结果。^③

1978年,国际卫生组织中的这种紧张局面到达顶峰。当时消灭天花项目就快成功收尾,而世卫组织的成员国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举行会议,庆祝世卫组织成立30周年。大会最终发表了一份宣言,设定了宏伟的目标。它重申了世卫组织章程中对“健康”一词的广泛定义,即“身体、精神和社交方面完全健康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状态”。宣言还承诺,世卫组织要实现“到2000年,使每个人都享有健康”。^④《阿拉木图宣言》被视为世卫组织致力于横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其目标被定义为向全世界所有人口提供初级卫生保健。这包括“关于普遍存在的卫生问题以及预防与控制这些问题的方法的教育;促进食物供应与适当的营养;充足的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妇幼保健,包括计划生育;主要传染性疾病的疫苗接种;预防与控制地方性传染病;常见疾病和伤势的恰当治疗;以及基本药物的供应”。^⑤对支持这些目标的人而言,消灭天花的成功可能会分散组织的注意力,该项目鼓励以牺牲宣言所设想的更广泛的项目为代价,专注于狭隘的技术干预。

① Sung Lee, “WHO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Contest for Ideology,” in *Western Medicine as Contested Knowledge*, ed. Andrew Cunningham and Bridie Andrews (Manchester, UK, 1997), pp. 24–45. “横向”与“纵向”之争,有时被描述为“整体”(holistic)与“简单化”(reductionist)的道路之争。

② 笔者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对亨德森的访谈,2007年7月18日。

③ David A. Tejada de Rivero, “Alma-Ata Revisited,” *Perspectives in Health: The Magazine of the Pan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8, No. 2 (2003), pp. 2–7.

④ Socrates Litsios, “The Long and Difficult Road to Alma-Ata: A Personal Refl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32, No. 4 (2002), pp. 709–732.

⑤ 《阿拉木图宣言》全文,参见:<http://www.WHO.int/hpr/NPH/docs/declaration-almaata.pdf>。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对消灭天花项目态度暧昧，但它还是从项目最初想到后期执行的各个阶段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国际治理和合作的制度框架给了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医疗官员一个平台，使他们可以构思和阐明消灭天花是一个需要协调一致的全球解决方案的全球问题，然后以方案加以解决。毕竟，在国际机构出现之前，国际卫生只不过是关于检疫条例的协定，这些协定将疾病控制视为一个需要采取防御措施以加强国境不受（传染病）侵犯的国家问题，而不是一个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采取协调行动的全球性问题。^①正是联合国宣布将1965年作为“国际合作年”，为富有同情心的美国官员提供了契机，使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将全球天花消灭项目的想法带到白宫并获得支持。此外，如果没有世界卫生组织这一框架提供的中立空间，定义该项目的协作型超级大国关系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一框架使冷战时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被暂时搁置，从而为在共同的“高度现代主义”的进步语境下采取行动创造了条件。如果说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一个组织，有时是消灭天花项目必须克服的“障碍”，那么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性和协作性的平台，它又是不可或缺的。

消灭天花项目的故事不太符合冷战史的常规叙事。就在消灭天花项目的成果获得认可并向世界宣布之际，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缓和局势崩溃，苏联出兵阿富汗，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凭借强硬的反苏言论接任总统之位。天花在全球范围的消灭，依靠的是各国政府、非国家行为体以及个人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超越了南北方和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当我们尝试将消灭天花项目的历史与全球卫生史纳入更广阔的冷战史的叙事框架中时，我们面对的概念、分析与方法论方面的挑战迫使我们质疑一些文献的基本分类与叙事结构，从而帮助我们扩展当前的叙事边界。这要求我们在思考超级大国的合作和冲突的可能性等问题，并在南北互动的语境下——这种语境并不完全符合新殖民主义的框架——思考抵制与合作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当然，它也要求我们突

^① Neville M. Goodman, *International Health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Work* (London, 1952), pp. 40-65.

破以国家作为主体和舞台的历史视角，探索国际组织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领域扮演的角色。^① 此外，它也表明，我们需要将国家分解为国际行为体，不局限于通常所理解的外交政策机构的范畴，考察像美国传染病中心这类很少在当前的国际史叙事中出现的机构的作用。由此，我们才能更全面地描绘那些既不是主要由外交政策和外交机构，也不是由任何一个国家自己构建起来的关于历史原因与意义的网络。

将全球疾病控制纳入冷战历史是一项挑战，它需要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丰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展国际事务史在主题和分析方面的维度。战争、安全和经济方面的主题，同文化交流、社会运动以及观念和规范的跨国传播方面的主题一样，都是国际史的核心内容，并且随着该领域研究方法的发展，这些主题无疑会变得更加重要。^② 此外，我们也需要更深入、更持续地探索国际范围内的其他主题——如传染病与公共卫生、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以及全球语境下的环境问题，它们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它们在该领域近期在方法论和主题方面的研究进展中一直未受到充分关注。^③ 这些主题在当今有关国际事务和全球化的讨论中已经占据着核心地位。疟疾、肺结核、艾滋病、禽流感等全球卫生问题，成了比尔·盖茨、安吉丽娜·朱莉等名人所关注的热门议题，并吸引了政策制定者和全球精英的关注。因此，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将兴趣转向这些方向，这并不奇怪。对于国际史学者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时代。

① 这是入江昭等人倡导的一种研究路径，参见：Akira Iriye,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eds. Thomas Bender (Berkeley, CA, 2002), pp. 47–62; 这一研究路径近期被热烈讨论，参见：“AHR Conversation: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No. 5 (December 2006), pp. 1441–1164,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C. A. Bayly, Sven Beckert, Matthew Connelly, Isabel Hofmeyr, Wendy Kozol, Patricia Seed.

② 这些在普卢默的文章中有很好的概括，参见：Brenda Gayle Plummer, “The Changing Face of Diplomatic History: A Literature Review,” *The History Teacher* 38, No. 3 (May 2005), pp. 385–400.

③ 关于全球环境史，参见约翰·R·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的著作。关于环境外交史，参见：Kirkpatrick Dorsey, *The Dawn of Conservation Diplomacy: U.S. – Canadian Wildlife Protection Treatie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Seattle, 1998)。此外，这些领域还有许多可继续探索的空间。